

一代华人移民自然叙事中的身份建构个案研究

王梓涵, 赵玉荣*

东北大学秦皇岛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DOI:10.61369/SE.2026060012

摘 要 : 身份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处于持续协商与重构的动态过程之中。本文以叙事定位理论为分析框架,以美国洛杉矶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访谈资料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移民经历如何作用于身份建构过程。在职业发展方面,受访者常将早年的职业选择描述为受时代环境驱动,而在移民后的叙事中,则逐渐将自己塑造为能够自主抉择的行动主体;在文化认同方面,受访者的自我定位经历从单一民族国家认同向跨文化、跨国界的双重认同转变;在家庭关系方面,尽管生活轨迹发生显著变化,其在家庭中的自我定位却呈现出相对稳定性。身份建构贯穿叙事始终,故事层面通过重构人生经历突出主体能动性,互动层面面向受众进行自我辩护,宏观话语层面则将个人经历嵌入主流移民生存叙事与国家复兴话语之中。

关 键 词 : 叙事;定位;身份;华人移民;一代移民;访谈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Natural Narrati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Wang Zihan, Zhao Yur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Abstract : Identity is not a static entity but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tinuous nego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Drawing on narrative positioning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interview data from a first-generation Chinese immigrant in Los Angeles to explore how migration experiences shape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career development, the interviewee initially portrays her early career choices as being constrained by histor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while, in narratives of her post-migration life, she increasingly positions herself as an autonomous agent capable of making independent decisions. With regard to cultural identity, her self-positioning evolves from a singular nation-state identity to a tran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dual identity. In the domain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although her life trajectory undergoes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her self-positioning within the family remains relatively stab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permeates the narrative at multiple levels: at the story level, the interviewee reconstructs her life experiences to foreground personal agency; at the interactional level, she engages in self-justification before her audience; and at the macro-discursive level, she situate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in dominant narratives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 narrative; positioning; identity; Chinese immigrants;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interviews

引言

移民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移动,更是改变个体对过去、现在、未来认知的关键节点。对第一代移民来说,他们的人生故事大多是以回溯的方式来讲述的,早期经历常常会和后来的抉择、结果一起被重新解读。在讲述的过程中,移民不是简单地重复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会主动去建立意义、让自己的选择变得合理,并且在和家庭、社会、宏观社会变迁的联系中表明自己的定位。

本研究以中年时期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李女士的人生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她的人生经历涉及职业变化、文化归属还有家庭关系等重要方面。研究着重关注李女士讲述重大人生事件时确定自我定位的方式,以及这种定位怎样随着讲述的语境发生动态变化。本文依据 Bamberg 叙事定位理论,追寻叙事实践里的不同定位,探究李女士如何在叙事中建立连贯的自我认同。这个过程不是线性转变,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协商和建构过程。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下面两个问题:一是第一代华人移民怎样在人生叙事中对重大人生经历定位并建构自我身份,二是在职业、文化和家庭等不同方面的叙事里,身份定位呈现出怎样的动态协商过程。

基金项目: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S202619145086);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美国华裔移民自然叙事中的多重身份建构研究”(20YJA740063)。

作者简介:王梓涵(2005—),女,汉族,江苏扬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语言服务、话语分析。

通讯作者:赵玉荣(1969—),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翻译学、学术翻译、语言服务、话语分析。

一、文献综述

国际移民的语言、文化、心理的适应与选择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一方面是关于移民在海外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之一，是波特斯与周敏提出的分层同化理论。该理论对线性同化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移民融入存在多重可能路径：移民及其后代既可通过融入主流社会实现向上流动，也可能在结构性约束下面临向下同化，还可借助族群网络与社区资源实现选择性文化适应。这一视角凸显了阶层地位、族群资本与制度环境在形塑移民发展轨迹中的关键作用^[1]。另一方面，移民研究的视角也在逐渐拓展，从单纯关注居住国融入，向跨国和全球视角延伸。例如，Van Ziegert 考察了华人移民如何在跨国空间中建构共同身份^[2]，刘燕玲等学者从跨国流动的角度探讨了海外华人与祖国文化的关联，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下，居住国视角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而全球视角又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相比之下，跨国视角是现阶段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研究范式。应尽可能地开展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尽量补充和丰富不同的研究个案，并根据不同地区、阶级、代际等对美国华人群体进行细分^[3]。近年来，对移民身份的研究更加多元，朱安新等学者立足池袋情境提出“社会支持体系”分析框架，研究新华人移民社会适应模式，丰富了新华人移民社区成因研究的分析视角，充实了社会支持体系在移民问题上的应用与讨论^[4]；区缙以特定的侨乡传统村落为个案，调查全球化背景下与地方发展中的侨乡社会与跨国网络，展现华侨华人流动的生命体验与历史过程、家庭结构变动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分析其历经不同世代却依然坚持传承的中华文化认同^[5]；Wenjun Zhu 探讨了信息通信技术在维护美国华人移民文化和族裔认同方面的作用，强调了信息通信技术对身份认同形成的变革性影响，并深入分析了跨国背景下文化和族裔认同的持续协商过程^[6]；Zhipeng Gao 则从归属政治视角探讨在中西方地缘政治博弈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华人移民由于在东道国社会和中国国内的双重边缘化，所经历的双重不归属感^[7]。

自然叙事视角下的身份建构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但涉及移民经验故事的研究尚不多见。McAdams 和 Brockmeier 等关于碎片化、流动性自我如何在自传类生命故事中被塑造成为稳定性自我的理论探讨和经验性分析直接推动了自然叙事身份建构研究的兴起^[8-9]。Bamberg 基于自然叙事的身份定位框架是上述理论探索的集大成者，主张自然叙事的身份建构体现在三个层次：讲述者作为故事人物与其他人物关系的建构；作为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关系的设定^[10]；作为叙述者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此后他将第三层进一步阐释为作为交际者在主流话语或宏大叙事中对自我意识和认同的建构^[11]。他强调，一个人所讲述的人生故事是一种选择，这意味着人生故事并非固定不变。人生故事是情境性的建构，是为了特定目的、面向特定听众而讲述的。

总之，叙事定位理论提供了一个将故事层面、互动层面和社会层面结合起来考察身份建构的动态模型，为分析个体如何在具体语境中建构和协商自我提供了有效路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将该理论系统应用于移民叙事，对具体叙事实践中身份建构过程的细致分析仍有不足。本文将将以华裔一代移民为研究对象，引入叙事定位理论，从多层面考察其在具体叙事中如何建构自身身份。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托于一项在洛杉矶开展的口述史项目，由笔者之一发起，访谈对象涵盖多元移民背景，包括绿卡持有者及第一至第三代移民。本文聚焦于2025年3月对李女士开展的深度访谈。李女士为中年时期移居美国并最终定居洛杉矶的一代华人女性移民，其人生经历涵盖职业发展、跨文化适应、家庭生活等多个维度，较为集中地呈现了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份建构的过程，因此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本次访谈在受访者家中进行，时长136分钟，以普通话开展，并在获得受访者知情同意后进行录音。访谈过程中，采访者鼓励受访者以自身方式讲述人生经历，可自由回溯过往事件、反思移民历程、畅谈家庭生活与工作经历。与诸多自传式访谈一致，受访者的叙事并未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而是在研究者与受访者的互动中逐步形成。访谈录音随后被完整转写为文本资料，转写过程中保留了受访者原有的口语表达方式，未对口语特征进行清洗或规范化处理，以尽可能呈现自然叙事的原貌，为后续叙事定位分析提供依据。

本研究采用 Bamberg 的叙事定位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该理论主张自然叙事的身份建构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层定位聚焦“故事的微观生成”，探讨“故事在叙事时间与空间中讲了什么？故事中的角色处于何种位置？”；第二层定位探讨“为何在这个特定时间以这种特定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关注互动中参与者如何在访谈情境下共同完成叙事；第三层定位则关注“叙事者如何在更广泛的叙事中定位自己”，即叙事与更宏观的社会、文化进程的关联^[12]。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将从职业变迁、文化认同与家庭关系三个维度对研究对象展开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从“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到“主动选择人生道路的人”

在对于早年人生的叙述中，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人生轨迹主要取决于历史环境与制度安排，而非个人选择的人。她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源于国家建设的宏观需要。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干部紧缺。她的父亲作为一名新党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从广州调往广西帮助筹建糖纸厂。李回忆道：“我妈妈没办法，就只好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就跟着我爸爸来广西。”这次迁徙并非家庭主动选择，而是对国家政策的被动适应。后来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糖纸厂关停，她的父母被“拨到广西外贸”，李也因此因此在广西生活了二十年。

这种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感受，在她讲述文革期间的经历时尤为显著。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李将投身上山下乡视为该群体共有的历史际遇，而非个体意志所能左右的选择。这种被动性同样贯穿于她此后一段时间的求学与职业轨迹，无论是被调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是临时接到通知返校参加招工，这些机会均以体制调派的方式突然降临。回顾早年的职业培训经历，她坦言：“我真的那时候没想得太远，也没有人讨论，也没有人帮我们策划，前途什么都不知道。”此后的教师生涯中，这种状态仍在延续，各种选择依然受制于外部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的任教学科不再取决于专业背景，而是以外在的政治考量为先。李成为英语老师便源于此。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俄语地位下降，原俄语教师大多被迫转岗，英语成为当时环境下为数不多的可行选择。与此同时，因其“成分好”的政治身份，她还被安排教授政治、数学等多门科目，以填补师资缺口。教学内容亦高度服务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宣传，多聚焦于“毛主席万岁”等政治口号。当后来更合适的工作机会出现时，她却因地方人才匮乏而被学校拒绝放人。至此，从任教学科的确立到职业流动的可能，她的个人选择空间均被外部力量一步步收窄。

这些叙述构建了一段缺乏自主能动性的早年人生历程，其中关于迁徙、教育和工作的重大决定，一再被描述为历史大势、政治运动与行政决策的结果。在这一阶段，李将自我定位为被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的个体。然而，下文的访谈片段1则呈现出她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访谈片段1

63 L: 后来就去了护理学校。(.....)

64 Z: 你当时怎么找到这个地方?

65 L: 看报纸的。(.....) 我看的，我就找到这个学校，我就去这个学校报名，报名这些 address 啊，这些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啊，这些我都懂，我都自己“哒哒哒哒”就填完了。明天来上课，完了又学了一个月，他们上课的时候你不是全听懂的，但因为他们很多肢体语言，教你怎么洗手，教你怎么扶这些病人，怎么用机器，他都是很多的肢体语言，你一看你不用讲不用听，看就看明白了，不是很笨的人。

所以毕业了就拿了一个证，就他们分配工作，那时候公司还挺多的，我也知道在这个范畴里面有一些人。现在我才知这个病人有3个钟、4个钟、5个钟、6个钟，它是根据医生来给你定的，你看过医生了，医生就给你出，你可以用几个钟的护理。

(.....) 政府是有给钱给他们的，政府有给钱，(.....) 他们公司病的老的人越多，他们的公司收入就多了，是这样的。

66 Z: 但是你还是在家里——

(.....)

69 L: 对，你可以要求我是在家里服务，他那个护工就来你家里，我们在康州，我后来为什么去了康州呢，在护理公司里面6块2毛5，我加班又另外算了，晚上又另外算钱，所以有时候要是你去这1家4个钟，你还要到另外1家2个钟或者4个钟，你才够8个钟。

(.....)

75 L: 后来就在护理公司也做了几个月，做了差不多一年，因为我租的那个房东，92岁了那一年，他也有一个护理员来跟他服务。完了这个护理员告诉我，他说现在大赌场要招人，你不去？

我说在哪里？

因为我们不赌钱，那个赌场离纽约也两个半小时的路，那时候是8块多，从6块多到8块9毛多，我当然去了，我就去报名了。(.....)

我今天去，因为我们家不在康州，在纽约还要赶回去，随便哪个招就招哪个，闭着眼睛打一个勾，一看 EVS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该回去了，他就通知了，你下个星期。(.....) 我们就进去，签好多好多字，四五十页的签。

1. 第一层定位

第一层定位关注人物在故事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被叙述的自我如何相对于其他事物进行定位。在这段访谈片段中，主人公是李女士，其他事物包括护理学校、护理公司、医生、老年患者，以及后来出现的赌场。这些事物并未被塑造为主导力量，而是叙述者主动与之互动的环境组成部分。

在故事层面，李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行动力的主体。她从通过中文报纸发现护理学校，到决定去赌场应聘，一系列叙述中反复出现“我看”“我填”“我知道”“我去”这样的第一人称主动动词，不断强化着被叙述之“我”在事件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而那些通常被视为中年移民障碍的行政流程，在她的叙述中都被描述为可以应对的具体事务。

在关于培训经历的叙述中，李坦承自己语言能力有限，但并未将其视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着重描述了应对之策。“他们上课的时候你不是全听懂的，但因为他们很多肢体语言，教你怎么洗手，教你怎么扶这些病人，怎么用机器，他都是很多的肢体语言，你一看你不用讲不用听，看就看明白了。”在这一叙述中，被叙述的自我善于通过观察来弥补语言上的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故事世界中一个能干、善于适应环境的形象。

在护工工作经历里，医生和保险属于资源分配方，然而李并没有把自身塑造成该模式下的被动接受者。她讲述了护理时长是怎样依据医生的决定进行调整的、怎样通过在多个家庭进行工作来积累充足的工时。这样的讲述把她定位成一个明白且适应护理模式运作规则的人，而非受其掌控的对象。同样地，在转变到赌场工作的经历当中，这一形象持续留存。这次机遇虽说比较偶然，不过李把自己的决定形容为快速且果断。在并不清楚岗位要求的情形下，她依旧“闭着眼睛打一个勾”就完成了招聘流程。在这一叙述当中，行动的主动性又一次被放置于核心位置，强化了她作为行动者的姿态。

在第一层定位里，李建立的叙事自我在更换不同工作的进程中展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能动性。和早年受政治安排塑造的人生阶段不一样，此时的她能够自行做出决策、调整生存策略。这一方面的定位因而呈现出一种转变，即被叙述的自我从时代的产物转变成了行动的主体。

2. 第二层定位

在第二层定位中，分析重点转向访谈的互动语境，关注叙述者为何会在特定的时刻以特定的方式讲述特定的故事。该层定位不会聚焦在事件本身的发生经过，而是会去剖析李女士如何根据当下的采访场景，灵活组织自己的叙事内容。

Randall、Prior 与 Skarborn 的相关研究就曾经指出过，倾听者的人生经历，包括其背景、职业、性别及兴趣，都会影响讲述者对故事内容的选择^[13]。在本次访谈里，面对身为大学教授的采访者，李的叙事呈现出明确的自我辩护倾向。

这一点在她反复阐释各类制度机制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护理时长如何分配、保险公司如何运作、护理公司如何盈利等说明，既不是采访者主动提出的要求，也不是保障故事连贯的必要内容。李讲述这些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倾听对象，她预设在场的采访者对海外护理行业不够熟悉，因而将自己置于需要对此解释说明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她将自己定位为具备专业知识的参与者，其亲身经历赋予了她解读制度流程的话语权。

李讲述转行进入赌场行业工作的经历中，依然呈现出面向听众的叙事倾向。她预判到赌场可能带来的负面联想，主动补充说明了一句：“我们不赌钱。”这样的澄清，其实对故事情节的推进没有帮助，但确实有效回应了访谈场景当中潜在的道德评判。正如 Bamberg 所指出的，正是叙事的受众设计使其具有感染力与说服力，叙事的目的是影响听众，因为对一段叙事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毫无回应”^[4]。在当下的社会话语环境里，赌场相关的场景往往都会和赌博、成瘾等负面标签绑定在一起。李把自己的工作身份和赌博行为做出切割，提前化解了听众有可能产生的负面解读。这段澄清完全产生于讲述故事的互动场景中。

在访谈互动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护理制度的主动阐释，还是对赌场工作的道德澄清，她的叙事始终围绕着一个潜在的预设展开，即采访者作为一个置身其外的观察者，需要被引导、被说服。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更通过面向听众的叙事设计，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能够理解规则、主导自身轨迹的行动者。

在整场访谈的互动过程当中，不管是她主动去细致阐释的护理行业相关制度，还是针对赌场工作做出的自我澄清，她的表达始终都围绕着一个预设来展开，也就是默认采访者是需要被引导、被说服的一方。基于此她会面向听众的设计叙事，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能够理解规则、主导自身轨迹的行动者。

3. 第三层定位

在第三层定位中，李的叙事被置于更宏观的移民主流话语中进行解读。在这类话语中，工薪阶层移民常常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在异国他乡维持生计的能力，以此来确证自己做出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李的讲述遵循这一框架，围绕普通的工作生活展开。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她的故事被归入主流话语对移民生存能力的期待范围之内，借助日常劳动回应了“能否依靠自身劳动立足”这一议题。

她的叙述也不是那种歌颂式的“成功移民”故事。她没有着重讲阶层跃升或者个人成就，而是重点展现自食其力的能力。李所展现的形象是一位中年务工者，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慢慢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权。

（二）从“我是中国人”到双重认同

在移居美国之前，李一直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她在中国生活了49年，个人经历与情感认同早已深深扎根在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她的叙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有过永久定居海外的想法。

这一点也能从她在外贸行业任职期间，前往美国出差的亲身经历当中得到印证。当年的她其实是有机会留在美国发展的，但她果断回绝了这样的机会。她的祖母曾经问过她执意回国的缘由，她回答：“那时候我前途好得很，我不可能不回来，我也没有想过留下来，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我自己也不至于说无路可走。”在那个阶段，移居海外不是她想要的选择，甚至不会出现在她考虑范围当中。

她后来做出移民美国的决定，和20世纪90年代国内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很深的关联，随着国内外贸相关体制的逐步开放调整，传统的外贸行业失去了原有的发展优势，用她自己的话说，“所以我们外贸就等于多余了，没办法了，这回我也考虑要去美国了。”这样的表述能够说明，李女士最开始选择移民美

国，只是带有功利性的现实考量，她并不是因为对美国的文化有向往、产生了情感认同才选择移民，而是原有的谋生道路受阻之后，做出的一种务实选择。在她前期的所有叙述当中，她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中国人，美国只是一处可以谋生的落脚点，不是自己的情感归属地。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李的文化认同逐渐发生了转变。尽管她明确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但在后期的叙述中，她也表现出对美国的认同感。

“再说广州的人可能现在美国口碑更不好，但是可能内地也不知道，你们内地的情况我真的不了解。”

“我们康州啊，我不知道这里，我们康州的不是的，他帮你算，他说你62岁退休划算，你65岁退休也行。”

“但是中国人，唐人街，纽约更绝。他给你算62岁，你怎么拿政府的，所以他们都很聪明中国人，算得更清楚、更多。”

这种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她对人称代词的使用。当提及中国时，她会使用带有疏离感的“你们内地人”，这一表述将她自身置于“内地人”的范畴之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谈论美国的退休制度时，她会说“我们康州”，在语言层面上将自己归入美国当地社群。这种指称方式的变化，折射出她的归属感从中国转向了美国，体现其个体性的身份认同转变。不仅如此，李在叙述中还将自己与其他华人移民区别开来，称他们为“他们中国人”，在无形中将自已与那些在思维和行为上仍贴近中国的移民拉开距离，有意向美国的社会规范靠拢。

此外，李还反复对比中美两国在教育、公共服务、养老等方面的差异，并在这种对比中表现出对美国的偏好。这些评价与她年过七旬的生活境况直接相关，她正在切身体验着美国的公共服务与养老福利，这种现实层面的获得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她对美国的认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评价更多反映了李女士在特定年龄阶段和生活情境中的个人感受，而非一代移民群体对两国制度的普遍判断。然而，在访谈片段2中，当被直接问及身份认同时，她并未将自己简单地归入某一方，而是展现出一种介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重认同。

访谈片段2

320 Z: 我是说您是什么人，人家说阿姨李老师您现在是——

321 L: 我是中国人啊。

322 Z: 您是公民，但您还是更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其实您的身份已经是美国人了。

323 L: 就像谷爱凌说的，我在美国就是美国人，我在中国就是中国人。我有两条腿，我干嘛要非得砍掉一条呢？

324 Z: 说得太好了，没错没错。

325 L: 当今这个世界争来争去就是两条。(……) 东面一个西面一个都是这么大的国，为什么以前就是美国一家独大？因为那时候中国大、穷，站不起来。它经过这几十年自立自强，骨子里有这个气，还有那么多人要争气的，民族气在那里。等于我们那两个是隔壁家，以前我几个孩子又小又穷，都是流鼻涕的，现在我几个儿子都长大了，你还是你，我的儿子就长大了。

326 Z: 您这个比喻很生活，小时候就是流鼻涕。

327 L: 是啊，但是难道你看不见我儿子大吗？你看不见我儿子有实力了吗？但是我儿子的实力是我们全中国那么多人做出的贡献，我们也有贡献。

1. 第一层定位

在第一层定位中，核心人物包括李，以及拟人化的中国与美国。李首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身份稳定的主体，当被问及身份时，她明确表示“我是中国人”。即便采访者提醒她已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她依然坚持这一自我定位，这表明变更的法律身份并未取代她对中国的认同。与此同时，李通过类比构建了双重身份的定位框架。她引用谷爱凌“在美国我就是美国人，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的说法，并以“我有两条腿，为什么要砍掉一条”这一比喻加以延伸，将自己定位为可以同时拥有中国与美国双重身份、且不认为二者相互排斥的人。

李还借助地缘政治隐喻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定位。她将中国与美国比作两个实力相当的“家庭”，并以拟人化的方式描述两国关系。在她的叙述中，中国从前“大、穷”，如同一个孩子众多、生活困顿的家庭；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家庭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具备了与邻居平起平坐的能力。美国则被定位为那个始终在场的“隔壁家”，一个不得不正视邻家孩子已然成长的邻居。在这一对比中，李将自己归入中国这一边，强调“我们也有贡献”，将自己定位为国家共同体的一员，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总体来看，在第一层定位中，李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身份，其个人认可双重归属的存在。

2. 第二层定位

第二层定位强调叙述受到具体访谈情境的塑造。在自传式访谈中，个体所展现出的，是自己觉得理应成为的那种形象^[5]。从这一角度来看，李对身份的表述并非完全自发的自我表达，而是面向特定对象的策略性呈现。当被问及身份时，她当即回答“我是中国人”。考虑到采访者是一位中国教授，李可能在迎合一种潜在的期待，即民族忠诚与文化根源的重要性。她将自己定位为道德上正当的主体，而非为了融入美国而放弃“中国人”身份标签的人。

当采访者指出她的法律身份与自我认同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时，李并未试图否认或修正此前的表态，而是借助谷爱凌的例子和“两条腿”的比喻，将身份重新定义为一个情境化、可兼容的范畴。这一回应带有权宜色彩，它既保留了“我是中国人”的立场，又将采访者的质疑纳入考量，在不冲突的前提下拓展了身份的边界。随后展开的地缘政治思考，则进一步体现了李在访谈中主动承担解释者的角色。她不只是简单回答问题，而是借机阐发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将自己定位为能够对两国关系做出合理解读的主体。

3. 第三层定位

在第三层面的定位中，李的叙述与更宏观的国家话语相关联。她的讲述契合了当下中国关于民族复兴的主流叙事，即强调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日益强盛的历史转变。她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成就，并明确将自己归入这一集体之中，以“我们也有贡献”这样的表述，将个人经历嵌入国家发展的宏大进程中。

尽管她在访谈中表达了对美国各项制度的认可，却避免将这种认可转化为美国优于中国的价值判断。相反，她将两国描述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具有可比性的存在，中国是那个“长大了”的邻家之子，美国则是始终在场的“隔壁家”。这样的表述使她既能够肯定自己在美生活的现实体验，又能在价值立场上与中国主流话语保持一致。

（三）相对稳定的家庭内部定位

在李对移民前生活的叙述中，家庭相关内容鲜少出现，即便提及也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与此相对，移民后的叙事里家庭被提及的次数明显增多，但这些内容散见于不同话题之间，并未构成连贯完整的故事线索。由此可见，她在家庭层面的定位并非一条随时间推移而线性演变的轨迹，而是在访谈的不同片段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下文将以其中一段为例，探讨她在家庭内部的定位是如何构建的。

访谈片段3

45 L: 我这一次组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是打算不回去的。

46 Z: 那先生和孩子呢？

47 L: 丢在广州啊。那时候我小的儿子是在私立学校寄宿的，他都没回来。我大儿子也是在学校读书都没回来，但是我就告诉他我去签证了，我拿到签证回来了，我说我批了我随时可以走了喔。

他说你哪天走，我说不知道啊，我说买到票我就走掉了。所以那一天我自己走，就是推着一个箱子，因为是旅游嘛，B2 B1嘛，B1 B2的嘛，也不能多带衣服东西，就是一个小小的箱子。我就去了，买了纸、机票、车票，从花园酒店坐大巴就去到香港机场了。香港机场等一下上飞机了，买了车票就来了。

1. 第一层定位

在第一层面定位中，主要人物包括李、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儿子，但在人物关系的呈现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李将自己定位为家庭中的决策者，而其他家庭成员则被置于被动接受的位置。首先，在决策过程的叙述中，李采用了“我就是打算不回去的”这样的表达，突出决策的单向性，表明这一决定是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她的个人意愿。其次，在与大儿子的对话中，李采用“我就告诉他我去签证了”“我说我批了我随时可以走了”等表达，体现出信息传递的单向性，即告知而非商议。儿子的回应“你哪天走”只是对既定事实的确认，而非对母亲决定的质疑，这进一步强化了李在家庭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李在叙述中使用了“丢在广州”这一表达来指代丈夫和孩子的处境。从语义上看，“丢”通常带有一种主动舍弃的意味，甚至隐含一定程度的情感疏离或责任切割。在此语境中，该词的使用弱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将他们从需要被顾及的角色转化为被暂时搁置的存在。李对自身行动的描述则非常集中且连贯，像“我自己走”“推着一个箱子”“我就去了”等，这些表述共同搭建起一个以“我”为中心的行动序列。借助上述叙事方法，李在故事世界里把自己塑造成为在家庭中有着颇高自主性和决策权的主体，而丈夫跟儿子的话语权相对较少，对事件发展的参与度不高。

2. 第二层定位

在第二层定位里，李的叙述回应了访谈情境中隐含的对家庭角色的评价。当采访者追问“那先生和孩子呢？”时，这个问题暗含着对其作为母亲和妻子角色履行状况的关切。在这种语境下，李讲丈夫和孩子留在广州，还进一步补充两个儿子当时要么在寄宿要么在走读，这意味着孩子都有了妥当安排，减弱了她的离开对家庭的冲击。

李没有否定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而是通过补充说明家庭成员

的状态，让她的离开跟家庭安排形成一种相对协调的关系。她的行动是在家庭运作基本不受影响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她是自主性很高的决策者，另一方面，她依旧是家庭责任的承担者。

3. 第三层定位

她所讲述的内容展现出一种比较常见的移民叙事情况，也就是在家庭里有某一位成员会首先进入全新的社会环境，以此为后续家庭的迁移创造相应条件。就这个角度而言，李的个人行动实际上属于家庭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她跳出了原本的生活秩序，在情况不确定的时候率先展开行动，主动去承担初期所面临的风险，为家人铺就前行的道路，是家庭迁移的引领者。

换一个角度来讲，通常人们会期望母亲陪伴在子女身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职责。而她平实的语气、毫不犹豫的态度、对独自离开这件事的着重强调，共同塑造出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在人生的重大决策上，她并不依赖家人。这种态度微妙地偏离了传统的母职期待，然而又没有公开地对这些观念发起挑战。她既不是那种完全受传统角色束缚的母亲，也不是脱离家庭责任的个体，而是在家庭框架范围之内做出主动选择的人。

四、结束语

本研究将第一代华人移民李女士选为研究对象，对其人生故事叙事加以剖析，着重探寻在跨国迁移过程里她的身份定位是如何被塑造、协商的。研究依照 Bamberg 的叙事定位理论，从职业

变迁、文化认同、家庭关系这三个维度展开分析，这些维度共同展现了李女士如何在跨国移民过程中建构出连贯的自我认知。

研究结果显示，李女士的身份建构过程既体现出经典移民理论所重视的社会融入特性，又呈现出跨国流动时代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从分层同化理论来讲，李女士并非仅仅沿着单一同化路径融入主流社会，而是在职业发展、文化归属、家庭实践等不同领域形成了有差异的适应策略。尤其是在文化认同方面，她既保留着对中国文化的情感联系，又渐渐形成了对美国社会的归属感，呈现出超越传统“同化—保留”二元框架的身份实践。同时，从跨国空间身份认同角度来看，李女士的叙事表明，移民身份并非完全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域空间，而是在跨越原居地与定居地的社会关系网络里不断生成与调整。其身份认同既受个人迁移经历影响，也受关于成功、责任、家庭义务等宏观社会话语塑造。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身份建构不仅在个体经验方面发生，也融入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

本研究借助叙事定位理论对移民个体生命故事展开细致剖析，揭示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份协商的微观机制，为理解跨国语境下身份认同的动态建构过程提供经验与理论启示。研究运用单一案例分析方法，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结合更多案例进行比较，探究移民群体身份建构的差异性与共通性，也可以继续探索数字媒介背景下身份认同的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Portes A, Zhou M.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 530(1): 74–96.
- [2]Van Ziegert S. Global spaces of Chinese culture: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20.
- [3]刘燕玲. 居住国, 跨国和全球视角——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文献述评[J]. 东南亚研究, 2015, (6): 64–71.
- [4]朱安新, 张珏, 翟学伟. 新华人移民社区何以生成——社会支持体系视角下的东京池袋实地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23, (01): 90–98.
- [5]区缙, 温承聪. 马来西亚客家移民的家庭流动策略与中华文化认同[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2, (05): 114–128+173.
- [6]Zhu W. “I’m Forever Chinese”: The Role of ICTs in Cultural Identity Maintenan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C]//202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Pinnacle Academic Press, 2025: 203–211.
- [7]Gao Z.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immigrants’ double unbelonging and deglobalization[J]. Theory & Psychology, 2023, 33(2): 266–283.
- [8]McAdams D P. The development of a narrative identity[M]//Personality psychology: Recent trends and emerging direc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US, 1989: 160–174.
- [9]Brockmeier J. From the end to the beginning: Retrospective teleology in autobiography [M]//Brockmeier J, Carbaugh D.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 247–280.
- [10]Bamberg M. Positioning between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997, 7(1–4): 335–342.
- [11]Bamberg M, Georgakopoulou A. Small stories as a new perspective in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alysis[J]. Text & Talk, 2008, 28(3): 377–396.
- [12]De Fina A, Georgakopoulou A. Introduction: Narrative analysis in the shift from texts to practices[J]. Text & Talk, 2008, 28(3): 275–281.
- [13]Randall W L, Prior S M, Skarborn M. How listeners shape what tellers tell: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lifestory interviews and their impact on reminiscence by elderly interviewees[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06, 20(4): 381–396.
- [14]Bamberg M. Stories: Big or small: Why do we care?[J]. Narrative inquiry, 2006, 16(1): 139–147.
- [15]Lucius-Hoene G, Deppermann A. Narrative identity empiricized: A dialogical and positioning approach to autobiographical research interviews[J]. Narrative inquiry, 2000, 10(1): 199–222.